

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的 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马 兰, 张增田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摘要: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既是发挥立德树人重要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建立高质量专业化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抓手。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具有坚定教师理想信念、浸润教师职业情操与涵养教师个人品格的深层价值。当下高校师德建设面临着功利性认知对精神历史性的遮蔽、制度性义务对精神崇高性的削弱、理论性制度对精神实践性的消解等困境。为此,深化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通过加强高校思政教育建设、构建高校教学共同体、推进高校师德评价体系改革等三个突破路径发力,从而拓宽教师信念格局、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深化教师个人品格,助力教育家型高校教师队伍的培养。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高校教师师德;师德建设;大德;公德;私德

中图分类号:G645.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25)04-0001-07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5.04.001

师德是高校教师立教之本,是决定其能否肩负起价值启蒙、人格完善与文明传承时代使命的关键因素。师德是指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其内涵随着社会的教育职业活动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代便对教师明确提出的职业道德要求:“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1]揭示了教师以“身教”和“德化”指引学生形成符合社会伦理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教育使命。师德建设一直都是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师德建设,先后提出“三个牢固树立”“四有好老师”“四个相统一”“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2]等重要论断。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教育部结合新时代的社会发展特征,相继印发了有关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严禁有偿补课、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等十余项政策规章,力图通过外在的规范来提升教师师德素养^[3]。外在的约束与激励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高校教师的失范行为,但终究无法深层次地触动高校教师师德的内发机制。如何在外力约束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高校教师师德的自我生成,仍然是新时代师德建设亟须探讨的重要课题,“教育家精神”的提出恰恰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一、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的价值意蕴

教育家精神是指在教育行家专家、杰出教育实践人才、先进教育改革者身上折射出来的一种独特精神意涵、精神气质和精神元素^[4]。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并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5]。这种精神根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指向中国教育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将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能够在新时代为我们的师德建设提供一个蕴含中国传统伦理、以“大德”“公德”“私德”为精神内核的三维立体构架。

1. 明“大德”,坚定高校教师崇高理想信念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与“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是教育家之于国家层面的精神支柱与价值取向,彰显教育家既心系国家兴衰又致力于文化弘扬的使命担当与高尚情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是教育家精神的第一要义,表达了教师应是胸怀国之大者,矢志立德树人,将个人职业之“小我”融入教育事业之“大我”^[6]。这一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上古大禹治水因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大学》开篇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

收稿日期:2024-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1 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教科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和书写研究”(编号:BHA210147)。

作者简介:马 兰,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研究;张增田,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7]它倡导由个人之德推及国家之德,超越了小我观的局限,展现了更为宏大的大我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彰显了教育家“传承文脉、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是一种崇高的教育理念和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大境界、大胸怀、大格局,就谈不上给学生指点迷津、引领人生航向。”^[8]高校教师要有超越现实、时空和功利的境界,只有面向未来和星空,才能有“胸怀天下”的广阔视野和博大胸襟。“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教之所以能“化”,是因为教育如盐入水,浸润无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9],而学之本,则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精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更要将文化精髓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与自觉,从而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的弘道追求。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将“报国弘道”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既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实践指向,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战略支点。明“大德”是国家伦理层面的师德要求,构建了高校教师的精神坐标,其纯粹性直接决定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品格与文化厚度。明“大德”在高校师德建设中指心怀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崇高境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定理想信念。《论语》有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1]道德追求应置于知识技艺之上,教师要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基。教育信念是高校教师对于人才培养、技能传承与学术创新的坚定信念和长远规划,它构成了教师的精神基石和行动指南。理想是教育者对高等教育未来蓝图的构想与目标设定,信念则是他们对育人育才坚定不移的信任和执着追求。二是厚植爱国情怀。爱国情怀不仅是高校教师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更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热爱与坚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道路的拥护与支持。这种情感要求高校教师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2]的担当,将个人职业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以育才报国为时代使命。三是弘扬献身高等教育精神。人是民族之本、国家之本,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要求在党领导下的高校师德建设要弘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将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祖国迈向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服务。“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3]。真正的教育者应超越物质条件的局限,以传播真理为志业。高校教师应当以深植职业价值认知为先导,秉持“箪食瓢饮亦弘道”的师风风范,在持守教育初心实现精神境界的升华,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既是教育家精神第一要义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师德建设的丰富内涵。

2. 守“公德”,浸润高校教师良好职业情操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和“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是对教育伦理的本体价值回归,它们共同构筑了教育家的职业精神。“仁爱之心”是教育家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源泉,它包含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和热爱学生等三个内在联系的层次^[14],体现了“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15]的情感力量,成就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墨子曾“以裘褐为衣,以跣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16],展现了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树立了热爱学生的榜样。朱熹“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17],诠释了当教育者沉浸于传道授业时精神力量可以超越肉体痛苦的“乐教忘忧”境界。这既是热爱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的表率,又是热爱学生的典范。“育人智慧”是教育家成长成就的实践工具,是教育家践行仁爱之心的方法论路径。“夫子教人各因其材”,教育并非简单地将书本上冷冰冰的知识灌输给学生,不是以抹杀学生的无限可能性为代价培养千篇一律的“单向度的人”,而是“循循然善诱人”,使学生由浅入深、由远及近,越学越有兴趣,并且通过教育来启迪学生的智慧、滋养学生的心灵。王阳明指出:“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18]强调教育应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边界(分限)因材施教,如同灌溉树木需依其生长阶段调整水量,为个性化教学和分层培养提供了历史注脚。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仁者爱人”的伦理观与“不愤不启”的方法论共同塑造了师德的温度与智慧。这既是教育家精神的内核,也是现代教育追求的重要目标。

立足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使命与人才培养任务,“仁爱启智”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有利于引导教师恪守“公德”,浸润良好职业情操。这既是落实“四有”好老师标准的实践要求,更是实现本科生创新素养与研究生学术能力培养的价值引领。公德原本是作为社会群体中共有的道德规范,是“共同的价值和规范的形成,意味着伦理超越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私人道德”^[19],不仅外显为公共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更是内隐被人们共同认可的一套社会价值理念。这一社会价值理念通过个体的理解与感受将其外化为个体对所处公共关系的领悟与治理,以此促使社会德性的实现。由于教师职业的教育性和示范性,公德不仅是高校教师作为社会实践中的一类群体所遵循的社会道德准则,更是高校教师对于自身职业所具有的更高层次的自我约束与道德规范,是职业规范与准则的内化,即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内在准则^[20]。“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21]。高校教师守“公德”是科研与教学相统一、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要求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22]。在此意义上,高校教师的“公

德”分为消极性“公德”和积极性“公德”。消极性“公德”是指“有所守”的师德,它要求教师避免一切有损教育公正、学生权益及职业声誉的行为,以保持高等教育活动正常进行;积极性“公德”则指“有所为”的师德,它要求教师主动作为,积极探索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时代新人,促进高等教育达到目标和效果。消极性“公德”与积极性“公德”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高校师德建设的“公德”框架。如果说“有所守”是师德建设的道德基准线,那么“有所为”既是社会对高校教师的道德期待,也是高校教师对高等教育的职业追求。

3. 严“私德”,涵养高校教师高尚个人品格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与“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是教育家在个体层面的具象化投射,彰显了教育家高度的专业精神和严格的自我要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出自《世说新语》,强调德才兼备者需以身作则,用言行树立道德与学识的双重典范。重师首在师之自重,教育家之所以成为世范,是因为他们能够严于律己、勤于修身^[23]。孔子曾对个人德行的示范作用作出论述,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4],提醒我们注意修身为本的私德在复杂环境中的影响力。荀子强调“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25],身而为师要做到以身作则,树立正确的行为标准。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育’中包含了修己的含义,教师积极的‘立身’之德就是在人生的实践中追求自我完善。故而,修己、立身、成德是教师发展自觉的永恒功课”^[26]。中国传统士人“修身以为教”的实践哲学在此处获得了现代性转化。“勤学笃行、求是创新”是教师职业特有的个体精神,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发展动力。古人治学讲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教学相长”,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既是在传统思想基础上紧贴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教师以个人发展促学生发展、走向教师强国的必由之路。“勤学笃行”表达了对知识的追求,“求是创新”强调了在知识中的实践。王充认为,“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27],强调人的知识是后天通过感官和经验获得的,并非天生具备的,即使圣贤也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增长知识,而不是凭空知晓一切。一个教师的专业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专业学问上的“勤学笃行”,而教育实践的“求是创新”能够丰富已有认知体系,促进对教育认识的升华。

立足大学作为学生社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垂范躬行”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既是塑造学术伦理与职业道德榜样的内在要求,更是护航青年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育人担当,有利于引导教师严“私德”,涵养高尚个人品格。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概念,是存在于小群体或者个人领域的行为规范。社会规范通过个体的不断反思和省察,以此内化为个人德

性,即个人品格。“梁启超发起了‘道德革命’,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这对概念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先河”^[28]。他认为,公德利群、私德修身,是人的一体两面,如果没有良好的作为基础的私德修养,便难有良好的公德表现。“人无德不立”,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十分重视私德修养,主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彰显了递进的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好老师既是“解惑”“授业”的“经师”,更是“传道”的“人师”。传统社会中的教师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的角色,而是亦师亦友、亦父亦子的关系。在这种伦理本位的传统观念下,“师者如父”“天地君亲师”使师德更多体现为具有服从性的师道尊严。高校教师处于更严苛的道德评价中,因此需要具备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这既是对高校教师角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高校师德建设的明确要求。这种双重向度的私德要求,使高校师德建设具有知行合一的实践论意义。语言学家王力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修订《汉语史稿》,其考据的严谨性本身构成了学术伦理的示范;农学家丁颖赤足行走稻田,躬身实践的姿态便是最有力的劳动教育。可见,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教师私德建设,在于实现教师“学术人格”与“生活人格”的统一,使师德从制度规训内化为精神自觉,最终达成“学问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至高境界。

二、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的现实困境

1. 师德的功利性认知遮蔽了教育家精神的历史性

教育家精神的历史性是指其根植于教育文明演进的历史连续性,呈现为对师道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重构,这种精神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始终构成高校师德建设的文化基质。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教育家精神不仅映射出各个时期的社会特征、价值取向及文化传统,也指引着教育者的行为准则与职业追求。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院系调整构建社会主义高等工科教育体系,高校教师群体中涌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他们培养适应国家需求的专业人才;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创新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文科、财经与政法专业得到加强,并发展了一大批新型边缘学科,促使高校教师不断探索高等教育的新模式与新方法^[29]。教育家精神在高校师德建设中的内涵随时代发展日益丰富,既彰显教育理念的创新与进步,也诠释了高等教育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当前部分高校教师在师德认知上出现了偏差,学术功利主义正在动摇高校教师群体的精神根基。在绩效导向的评价体系中,“非升即走”的生存压力迫使教师将科研创新异化为技术指标竞赛,家国情怀被窄化为论文产出的工具理性。对科研产出量化追求的背后暴露出的是学术活动从“为生民立命”向“为指标立命”的价值坍塌。当学术研究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时,高校教师便从“文明摆

渡人”降格为“知识劳工”。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在如此“计量游戏”中逐渐空洞,高等教育的长远价值逐渐被遮蔽。这种功利性倾向会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片面追求短期的知识技能提升,或简化教学投入,从而忽略对学生道德品质、创新精神及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最终背离了教育的本质目的。

教育家精神作为中华文明赓续与教育伦理演进的结晶,其内核必然与学术功利主义风气背道而驰。当前高校师德建设中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与应用尚显不足。一是师德学习形式应付化。教师将精神学习视为例行公事或信息接收,甚至视为与自身职业无关的额外任务,教师在参与师德培训时多停留于事迹复述与文件誊抄。这种“去主体化”的学习模式实质是学术绩效体系对价值理性的压制,当教师疲于应对科研指标时,教育家精神的内化必然让位于短期的职业生存策略。二是师德学习内容表面化。《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有的地方对教育和教师工作重视不够,在教育事业发展中重硬件轻软件、重外延轻内涵的现象还比较突出。”^[30]在师德学习中过度聚焦教育家的生平年表与事件细节,却忽视其思想境界的当代转化,既没有从教育家精神中的事件、经历和成就及其之间的关系中汲取经验,也没有在教学实践中以教育家精神反思自身。这种考据式的学习倾向实则是功利主义对历史深度的消解,它使教育家精神沦为博物馆中的标本,而非滋养师德的活水源头,导致教师忽视了对其思想境界、坚韧不拔精神及家国情怀的体悟与传承,从而限制了高校师德建设的精神高度,便也无法从教育家精神中获得行之有效的教育观念和方法论。

2. 师德的制度性义务削弱了教育家精神的崇高性

教育家精神的崇高性是指其对教育伦理理想境界的超越性追求,表现为以精神感召替代功利计算、以道德自律超越制度规约的价值特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管理系统针对不同岗位和职业的人所需承担的不同社会责任,以制度形式规定了各种如政治义务、法律义务、职业义务等“制度性义务”,直接或间接由国家、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等外部强制力量作保证,具有强制性和客观规定性。不同专业人员的义务要求千差万别,因此人们往往只关注和履行自身的义务范围而不敢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制度性义务的刚性框架使高校师德建设从伦理自觉异化为技术规训。《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等官方文件都规定了师德建设的标准,但是许多学校仅仅关注教师的个人品德和科研学术等外在表现的问题,并且把防止学术不端、品质败坏作为师德建设的“底线”在推进^[31]。“底线”即“有所守”的师德,它规定了教师禁止的行为以确保教育活动正常进行,然而过分关注“底线”会忽视“上限”的存在,造成高校师德建设的消极

应对和教育追求的弱化。当“乐教爱生、启智润心”的教育伦理要求被简化为“课堂考勤率 100%”“零教学事故”等冰冷指标时,高校教师的道德实践便从价值自觉退化为数据达标。教育部相继出台《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从“七条禁止”到“十项不得”为高校师德要求划定了明确红线。个别高校并未理顺核心制度的校级落实机制,尚未建立校本化实施细则,其制度文本停留于原则性表述,存在定性要求与量化指标失衡、评价维度中主观裁量与客观标准配比失当等实操性缺陷^[32]。这不仅与官方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相去甚远,而且妨碍了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虽然教师本身有良好的道德意识和义务观念,但是碍于制度的约束和惩处而不敢负担超越制度范围的道德义务,以致教师无视和漠视制度未规定部分的道德,如“教师下课不管事”。如此,制度性义务便遮蔽了教师道德义务,以制度责任为借口否定道德责任。

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群,它的好坏和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素质教育的推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为其构建了以理想信念的大德、职业伦理的公德和个人品格的私德组成的道德体系,但在现实中往往只重视中间层次的职业道德建设,仅仅满足于按时按量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不出教学事故等表面指标上,而忽视了对教育人工作的深厚热爱与投入,难以做到将个人品格、理想信念与职业道德修养相互融合,导致原本就以专业性、操作性见长的高等教育课程和教学活动更加缺少渗透力和感染力。“底线”的设定将师德考核异化为“负面清单”考核,只讲“有无”而不讲“高低”,只关心“合格与否”而不关心“优秀与否”,使应对师德所秉持的高标准和高要求变成了基本标准和基础要求。高校师德的“制度性义务”导致教师对师德认知浮于表面,漠视了精神所具有的崇高性,将其视为能够使用单一标准进行衡量的内容,忽略了教师对教育家精神这一精神特质的认同和敬仰。

3. 师德的理论性制度消解了教育家精神的实践性

教育的精神意向是对人性之善的执着追求。教育家精神的实践性是指通过教育行动达成伦理价值的生成性建构,实现从“致善”(追求善)向“至善”(成就善)的动态跃迁。德行论主张,个体的道德导向驱使其以理性的方式追求至善的目标,而行为主体的美德正是在这一不断追求善行的德行实践过程中逐渐成熟并得以完善^[33]。这种道德目标与实践过程之间共生共长的关系在教育家精神中得到深刻映照,并进一步指出了实现“善”的行动指南和实践方向。“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师实践智慧,“乐教爱生、因材施教”的现实性和情境性提供了师德的实践场域,让教育精神超越意识层面,落实于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学实践中,从而在实践中巩固对教育精神的习得和感悟。可见教育家精神和师德建设的内涵是高度一致的。当前高

校师德建设往往偏重于制度构建与管理规范,缺少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师德建设的有效机制和平台,教育家精神的实践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出现高校师德建设实践与理论相割裂的现象。

首先,教师缺乏将二者进行融合的行动自觉。教师是融合过程的关键主体,但现实是一些高校教师对于时间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使自身无暇顾及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之外的其他知识的学习和精神领会,由此缺乏对教育家精神与师德建设的内在关系的准确认识,更难以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教育家精神融入师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其次,部分教师知识储备不足,知识结构不合理。理工科类的教师人文素养不高,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教师又缺乏理性思维与科学精神^[34],从而导致缺乏促使二者有效融合的关键要素与适用策略。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需解决如何将相关人物、具体时间及思想与高校教师教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通过反思与实践来深化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仅仅依靠事迹宣讲与文件学习而缺乏情景模拟、实践反思等参与式设计的灌输式培训方式,难以提升教师的道德实践能力,同时在操作中往往出现生搬硬套的情况,不仅未能实现相辅相成,反而可能削弱教育家精神的学习效果与师德建设的整体成效。最后,高校管理层在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师德建设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机制。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将官方文件作为标准与参考,而未能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融合制度与实施方案。这种“重文件轻转化、重考核轻滋养”的治理逻辑严重阻碍了教育家精神在高校师德建设中的有效融入与深度发扬。

三、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的突破路径

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的新要求,即“坚持教育家精神弘扬践行,筑牢教育家精神践行主阵地,引导广大教师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35]。以此为基本遵循,是破解当前高校师德建设困境、强化高素质专业化教师培养与供给的有效实践途径。从加强高校思政教育建设、构建高校教学共同体、推进高校师德评价体系改革等三个方面推进师德立体式架构的建设,让高校教师队伍在良好师德的引领下为加快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1. 加强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以“报国弘道”拓宽教师信念格局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36]。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37]在此战略部署中,高校作为专业人才

培养的主阵地,师德建设亟须以“报国弘道”精神典范激励教师肩负起为党育才、为国育才的历史重任。“大德”精神对高校师德建设的深层价值在于对高等教育功利化的消解与对高校教师精神信仰的重建,报国信念为高校教师提供价值抗辩的武器,弘道使命促使高校教师成为价值理性的守护者。以强化“大德”顶层制度设计的高校师德建设实践应着重于两个方面:

第一,构建融入教育家精神的思政教育体系。党的领导是师德建设的根本保证,高校各级党委应该发挥领航作用,划拨专项经费用于师德建设工作,并确保经费充足且专款专用。同时,依据学校学科专业布局、科研教学任务以及教师队伍结构等实际情况,优化师德建设标准。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条件欠缺的院校可以设立教师思政教育专门机构或小组,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师德培养的核心课程,以学科建设带动思想基础建设,为培养教师思政素养提供关键平台和学理支撑;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思政教育的学科阵地建设和党建学习,丰富课程设置,开设如“教育家精神与思政教育”“新时代高校师德内涵与实践”等特色课程,定期组织专题学术会议或教师集体学习、红色教育实践活动及国情社情调研,引导教师深刻体悟“报国弘道”的精神内涵,并鼓励分享交流,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创新性开展师德宣传工作,树立并推广高校师德典范。在庞大的高校教师群体中不乏品行高洁的教育家型教师:黄大年教授放弃英国剑桥大学的优厚待遇,归国从事科研并将全部成果归属国家;张礼教授93岁仍坚守讲台,并在其量子力学课程中强调科学探索必须服务于人类福祉。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高等教育的魅力与师德的光辉,比抽象遥远的教育家更能触动人心。我们应积极深入发掘这些优秀教师的案例,在理工科院系设立科学家精神实证教育基地,复原“两弹一星”元勋手稿,大科学装置建设日志等物化精神载体,开展科研伦理情景模拟工作坊。在人文社科院系创设师道传承创新工坊,通过经典文本共读、教育叙事重构等实践促进教育家精神与当代社会议题对话,实现师德师风的深层次渗透与内化。这不仅为教师提供具体的榜样学习途径,更在情感上引发同为教师的共情。

2. 构建高校教学共同体,以“仁爱启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以及智慧灵活的教学方法构成了教师育人的‘智识’”^[38]。教学是教学相长的过程,“为教”或“为学”过程中积累并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洞见,凝练成为教师的育人智慧。这种智慧只有嵌入“仁爱启智”的教育伦理框架,并通过教师共同体的协作性反思与创新性转化,才能突破个体经验局限。营造高校教师良好成长环境,以“仁爱启智”精神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重点在于建立和谐有效的高校教师教学共同体。

第一,重塑教学主体关系,构建共生型教学共同体。在传统教育中,师道尊严的教育理念、服务与管理的教管方式使教学主体关系一直处于不平等状态。区别于基础教育对课堂纪律的规范,高校师德建设需要突破传统师道尊严的单向权威,建立师生双向成长的学术共同体机制。只有教师充分认识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才能构建合作的师生关系。通过转变认同理念,破除老旧陈腐的教育思想,认可每个学生的独特性与价值,重视师生关系在教学风气和教学文化如校风、校训中的精神表达,从而营造一种相互尊重和认同的教学主体关系文化。

第二,建立教学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教育公平与资源共享。针对长期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导致教学资源两极分化的问题,高校应积极探索建立校际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将教育资源的“战略合作”升级为“战略共享”,由点到面系统化推进共享制度建设,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构建慕课西行认证体系。如清华大学通过国培项目“中西部高校青年教师融合式教学进修项目”,利用数字孪生理念,通过克隆班将校内课程开放给青海大学、新疆大学等中西部兄弟院校^[39]。同时,从国家政策出发减少不合理的教学制度,缓和校际过度竞争,减少教学资源的浪费和重复性建设,从而为教师的充分发展腾出更多空间。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过程,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学效率。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40]的战略决策。在这一时代趋势下,高校应积极拥抱教育数字化转型,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和加大数字设施使用的普及程度,提升高校教师的数字素养。一方面,建设智能教学过程协同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同时满足主体的个体利益和个性需求,从而实现教学主体与教学内容的多元化要求的高效协同,增强高校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连接和成效;另一方面,2022年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与专业发展的教师数字素养等三维三级框架。高校可依据这一标准建立分层培训体系,通过基础技能普及与前沿技术研修提升教师数字能力,并将数字素养纳入考核评价中,以激励机制和伦理规范双轮驱动教师持续发展。

3. 推进高校师德评价体系改革,以“垂范躬行”深化教师个人品格

第一,构建学术伦理导向的动态师德评价机制。高校师德评价应紧扣高等教育的学术责任与创新使命,确立“学术-育人”双轨评价框架。实施学术伦理全周期审查,在教师聘期考核中,引入“学术生命历程伦理档案”,对重大科研成果的原创性验证及团队协作贡献进行详细记录。建立育人实效动态监测体系,开发课堂语音情感识别系统,利用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评估师生互动,助力教师提升育人水平。推行跨学科师德互评制度,在学科交叉项目设立由多学科教师组成的评审组,对科研合作中的权力关系、资源分配进行同行评议。同时,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师德监管机制,在校内和校外对教师职业倦怠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加大师德监测力度,制定师德“高标准线”,不仅要杜绝不作为的教师教育行为,对师德滑坡情况加以疏导,更要不断巩固和提高教师道德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强化“三尺讲台”,保持和深化教师教育初心。打破师生不对等关系,完善学生对教师师德评价通道,赋予学生发言权,共同有效参与师德测评与监督。

第二,强化社会监督,维护教师形象。高校教师作为社会高等教育的代表,其言行举止备受社会关注。个别教师的道德失范行为会在网络舆情的推动下迅速传播,把教师和学校放在家长和社会的对立面,削弱了家校社的育人合力,对学校教学管理造成严重影响。我们不仅要坚持师德违规“零容忍”,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极坏的严重师德违规行为从严处分,还要积极建立全方位师德评价体系,将思想政治和师德要求纳入教师聘用合同,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准入、评聘评优和课题申报等的首要参考标准。此外,还要充分遵循和利用校外的社会监管评价途径,畅通师德监督举报通道,严格落实师德建设监管长期性和常态化,建立师德失范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打造教师道德公信力,让“垂范躬行”的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德建设,成为教师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实现教师内生性的修德自觉。

参考文献:

- [1][7][9]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407,1673,1521.
- [2]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N]. 人民日报,2018-05-03(2).
- [3] 高慧斌. 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进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师德情况的调查[J]. 教育科学研究,2023(8):83-90.
- [4] 龙宝新,杨飞. 教育家精神的时代意蕴与涵育之道[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8-25.
- [5] 习近平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N]. 光明日报,2023-09-10(1).
- [6] 罗生全. 教育家精神的价值谱系及塑造机制[J]. 南京社会科学,2023(10):135-142+151.
- [8] 赵玄.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培育新时代强国之师[J]. 中国民族教育,2023(10):9-12.
- [10] 黄宗羲. 宋元学案: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664.
- [11][13][15]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481,2471,2510.
- [12]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675.

- [14] 李宜江. 师爱·施爱·实爱[J]. 当代教育论坛, 2005(20): 20-22.
- [16] 郭象, 注. 成玄英, 疏. 庄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560.
- [17] 黄宗羲.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580.
- [18] 王阳明. 传习录[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310.
- [19] 王新生. 市民社会论[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 182.
- [20] 林崇德. 师德通览[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1183.
- [21]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 75.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79.
- [23] 赵玄, 于维涛, 刘禹希, 等. 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核心要义、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J]. 当代教育论坛, 2024(3): 109-116.
- [24] 朱熹. 论语集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130.
- [25] 梁启雄. 荀子简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1.
- [26] 叶澜, 王 珏. 教师发展: 在成己成人中创造教育新世界——专访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J]. 教师教育学报, 2021(3): 1-11.
- [27]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084.
- [28] 陈乔见.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J]. 文史哲, 2020(5): 26-39+165-166.
- [29] 刘海峰, 史静寰. 高等教育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95-208.
- [30] 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 (2018-01-31)[2025-03-05].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1/31/content_5262659.htm.
- [31] 吴 平, 曾德军. 教学视角下的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探析[J]. 中国大学教学, 2019(5): 76-79.
- [32] 王凌超. 中美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的历程与特点比较[J]. 教师教育论坛, 2019(5): 72-77.
- [33] 卫建国, 高宇航. 论公共服务精神的三重伦理维度及其统一[J]. 伦理学研究, 2020(6): 7-14.
- [34] 周 军.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矛盾及对策[J]. 辽宁教育研究, 2007(3): 115-116.
- [35] 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 (2024-08-26)[2024-11-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8/content_6970676.htm.
- [36]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604.
- [37][4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38] 弘扬教育家精神, 培育时代新人——教育战线全国政协委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信, 畅谈“教育家精神与时代使命”[N]. 人民政协报, 2023-09-13(9).
- [39] 清华新闻网. 清华大学2024年春季学期克隆班56门本研课程面向全国百余万师生开放[EB/OL]. (2024-03-19)[2025-03-05].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76/110271.htm>.

Value Implication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nto Faculty Ethics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MA Lan, ZHANG Zeng-tia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faculty ethic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both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fulfill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a key lever for establishing a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ized faculty team in the new era. The integration carries profound value in strengthening teachers' ideological convictions, nurturing their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ultivating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 However, current effort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utilitarian perceptions overshadow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pirit, institutional obligations dilute its noble essence, and theoretic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undermine its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requires three breakthrough approaches: enhan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faculty,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academic community in universities, and reforming the faculty ethics evaluation system. These measures will broaden teachers' commitment to their ideals, advanc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deepen their personal integrity,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educator-modeled faculty team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 words: spirit of educators; university faculty ethics; construction of faculty ethics; great virtue; public virtue; private virtue